

壹、前言

當今教育改革的潮流朝向教育績效責任取向，強調教育的科學研究。在教育的歷史上，除了少數的例外狀況，政策分析已經被實證主義所主導（Lather, 2006: 783）。例如，美國1999年頒布的Reading Excellence Act，強調隨機的實驗（randomized field trials）作為證據本位（evidence-based）運動中的黃金準則（gold standard）。美國布希總統在2001年頒布的No Child Left Behind Act，聯邦政府企圖介入公立教育，立法制頒科學的方法，以提升教育的績效。2002年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(NRC)發表的Scientific Research in Education報告書，要求一種普遍性，客觀性，複製力與統一的科學理論。上述的法案顯示美國聯邦政府積極介入教育研究的企圖心，試圖以國家的力量提供指導方針，朝向證據本位的知識之共識的努力，更是屬於政策是為科學服務（policy for science）而不是科學為政策服務（science for policy）（Lather, 2004: 762）。

教育的對象是人，有複雜的認知活動與脈絡的特殊性，充滿著價值與判斷，似乎很難像自然科學的理論有放諸四海的規準。因此，以客觀的實證主義之方法論上的化約論（methodological reductionism）來研究教育，自然會有窄化教育研究與誤導的可能。社會科學本來就不同於自然科學，因為社會現象是意向性的一它們依賴於個體之有意義的行動，社會研究的目標，乃要在文化上具有特殊意義的種種安排的脈絡之中，去提供對人類行為的種種解釋（王思迅主編，2002: 943）。Bhaskar支持社會能以合乎科學的方法來研究，但不主張以科學家研究自然的方式來研究，他提出了批判自然論（critical naturalism）導因於社會和自然領域的差異，以及社會研究自我反思的必要性（Judd, 2003: 44）。

Foucault¹主張人文科學是「後設認識論」（meta-epistemological）是有限

1 Foucault (1926-1984) 是一個特別有天賦的哲學家、政治行動家、社會理論家、文化批判者、創意的歷史學家、法國最有名望學術機構的教授，以及不可違逆地塑造我們思考方式的世界知名的知識份子。Foucault是批判理論最重要的指標人物，他的理論大部分關注在權力、知識與論述的層面，他的影響力主要在後結構主義、後現代主義、女性主義、後馬克思主義與後殖民理論化。他的作品已經跨越了規訓（disciplinary）的領域，從社會學、人類學到英國研究與歷史。Foucault 的思想深受Kant和Nietzsche的影響。由於Foucault 學術思想的複雜性和研究領域的多樣性，可說是一位多學科的融和貫通者。Foucault和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Derrida、Deleuze 等人，通常被歸類為後結構主義者，雖然他拒絕這種標籤。他是法國新世代的思想家，成名於1960年代存在主義耗竭之後。存在主義最著名的代表人物—Sartre等人，將哲學定位在提升人類的研究。後結構主義則拒絕將人類獨尊為哲學分析的對象，認為它的焦點應該專注在社會的、語言的與思想的無意識決定因素。當Sartre主宰力量到1960年代結束後，Foucault和Derrida在後續的10年便逐漸取代他的地位。相關論點可參閱Oksala, J. (2008). How to read Foucault. New York: W. W. Norton.